

# 夫妻壓力與情感表露之相關性研究： 對偶分析

蔡佩靜 林梅鳳 陳宇平 盧怡任

**研究目的：**從對偶分析法探討夫妻之外在壓力、關係壓力對於情感表露相互影響的模式。**研究方法：**以92對台灣南部之夫妻，在取得參與研究同意書後，以實驗室法進行15分鐘夫妻衝突的實境討論錄影，之後再以問卷讓夫妻各自評量生活中的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資料。錄影資料由2位評分者進行分析、根據24編碼的中文化特定情感編碼系統為工具，分別檢視夫、妻在15分鐘互動中各自所表露的其情感行為，採對偶分析法檢視此三變項間的相互影響關係。**研究結果：**(一)夫與妻之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有正相關，且外在壓力與正傾向情感表露無顯著相關。(二)「妻外在壓力影響妻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妻正傾向情感表露」、「妻外在壓力影響妻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夫正傾向情感表露」與「夫外在壓力影響夫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妻正傾向情感表露」等三條路徑成立，顯示妻子在溝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程度同時受到丈夫之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以及自身之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所影響；而丈夫之正傾向情感表露僅受妻子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之影響。**研究結論：**台灣夫妻對於外在壓力、關係壓力以及情感表露之相互影響，其模式差異主要反映在妻子的壓力之感受所影響之夫妻的情感表露上，此結果可能與台灣夫妻互動的特性或是文化的影響有關。

**關鍵詞：**夫妻、壓力、情感表露、行動者與伴侶相依中介模式

蔡佩靜：戴德森醫療財團法人嘉義基督教醫院副護理長；國立成功大學護理學系碩士；專長領域與研究興趣為精神護理學。

林梅鳳：國立成功大學醫學院護理學系教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博士；專長領域與研究興趣為腫瘤心理、夫妻感情互動。

陳宇平：國立台南大學諮商與輔導學系教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博士；專長領域與研究興趣為性別、伴侶與家庭治療。

盧怡任：國立陽明交通大學健康心理中心/教育研究所助理教授；國立彰化師範大學輔導與諮商研究所博士；專長領域與研究興趣為受苦及轉化經驗相關議題、質性方法論以及學校心理學(通訊作者；E-mail: matt7075@nycu.edu.tw)

收稿：2021年9月25日；接受：2022年10月3日

# 一、緒 論

壓力是每對夫妻在踏入婚姻後必然會面臨的挑戰，其所面對之壓力種類多元，如：工作、經濟、其他家庭成員期待、彼此習慣和觀念上不同的壓力等（利翠珊，1995；Geist & Gilbert, 1996; Randall & Bodenmann, 2017），夫妻諸多壓力可進一步區分為在夫妻關係之外的外在壓力和在夫妻關係之內的關係壓力。此兩種壓力對夫妻而言皆具有強烈地相互影響力，造成夫妻在相處、睡眠、彼此溝通的障礙，導致夫妻間的情感惡化、婚姻滿意度減低，倘若壓力持續未獲得有效的改善，最後甚至會面臨離婚的狀態(Karney & Bradbury, 1995; Randall & Bodenmann, 2009; 2017)。因此，以早期介入心理衛生的觀點，探討此議題實有其必要性。

壓力情境可以反映出夫妻系統中的關係與調適，Randall 與 Bodenmann (2017) 在針對壓力與滿意度的文獻回顧中，提出壓力應從被視為個人主觀感知的觀點，轉變為被視為夫妻之間相互影響的系統因素。兩位學者也指出，源自於夫妻關係之外的外在壓力與源自於夫妻關係之內的關係壓力，對伴侶之關係滿意度有顯著影響。而在婚姻關係中，夫妻間溝通過程的情感互動占有重要角色，夫妻在溝通過程的情感表露可作為婚姻滿意度的預測因子(Gottman, 1994)。

夫妻之間的外在壓力、關係壓力以及夫妻溝通中之情感互動的相互影響歷程可作為檢視與預測夫妻婚姻狀況的重要依據，此為本研究的探討核心。故本研究將採用對偶分析取向有效檢視此一關係，以觀察夫妻壓力與情感交流的動態過程。

## (一) 夫妻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

過去對於夫妻關係的研究，多以女性個人的感受作為研究資料的來源，常忽略了婚姻是夫和妻兩個人結合而成的關係，較少研究是將夫妻視為一個單位進行探討（周玉慧，2004；2005）。西方學者 Bodenman 等人(Bodmann, 1995; Traa et al., 2015) 提出壓力與因應的系統交流模式(the Systemic Transactional Model, STM)，該模式指出夫妻各自對於壓力的感受會影響到配偶，丈夫或妻子個人對於壓力的感受及認知以及兩人之間對於壓力的溝通方式會影響到另外一方對於壓力的感受，進而影響到

自己和配偶在面對壓力時候的因應方式。夫妻對壓力的因應與交流可能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夫妻各自的情緒、健康和行為，而當壓力由一方感知進而影響夫妻雙方時，此壓力則成為「夫妻共同的壓力」。

壓力依其形式有兩種分類方式：1. 以「壓力源」作分類基準，分為夫妻關係以外的外在壓力（如：來自於工作、學校、或是其他的家庭成員或朋友的社會壓力），以及夫妻關係之間的關係壓力（如：來自配偶的令人不悅的個性和習慣、與配偶不同的觀點、對孩子教育目標不一樣的壓力）；2. 以「壓力強度」作分類基準，分為重大且具有變化性的事件的重大壓力（如：家庭成員罹患重大疾病、有新的家庭成員加入或退休等），及生活常見的事件的較小壓力（如：像是上班遲到、與人發生擦撞的交通意外等）(Bodenmann et al., 2006; Randall & Bodenmann, 2017)。在過去西方夫妻關係壓力的研究中，Karney 和 Bradbury(1995)所提出的「婚姻脆弱性-壓力-調適模式」(vulnerability-stress-adaptation model of marriage)指出影響生活的重大事件將使原本熟悉的生活規則被改變，是讓夫妻陷入婚姻困境的因素之一。Randall 與 Bodenmann (2009)更指出壓力甚至是導致夫妻離婚的原因之一，而關係壓力較外在壓力更能影響婚姻品質 (Randall & Bodenmann, 2017)。Jackson 等學者 (2016)針對社區中低收入、育有子女且結婚九個月內的 431 對新婚夫婦進行調查，發現金錢管理、家事分擔和與其他家族成員相處等，為最容易影響婚姻的外在與關係壓力事件，進一步檢視參與者認為此兩種壓力對婚姻影響的嚴重程度，參與者認為相較於關係壓力，外在壓力是更為嚴重且需急迫解決的。

在華人的夫妻關係研究中，利翠珊 (1995) 在 16 對婚齡 5 年內新婚夫妻的深度訪談互動歷程中發現，妻子由於中國傳統社會對女性的角色束縛關係，比丈夫更易感受到外在壓力，當此外在壓力超過妻子所能負荷之程度時，其將使夫妻溝通的過程中產生爭執或挫折感。另外利翠珊 (2005) 在台灣進行兩階段的夫妻研究，第一階段與 3 對育有障礙兒的夫妻，以深度訪談方式收集其對於壓力的經驗，發現壓力來自對子女的不捨與擔心、生活上的壓力與夫妻關係壓力，特別是生活壓力更容易成為夫妻爭執的來源，進一步影響夫妻關係壓力。以壓力源來看，對子女的不捨與擔心以及生活上的壓力是屬於夫妻關係之外的外在壓力，夫妻關係壓力則是來自夫妻互動的壓力。

上述研究皆顯示，夫妻婚姻品質受到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之影響。Westman (2006) 提出壓力的外溢 (spillover) 效應與伴侶 (crossover) 效應，外溢效應是指個人的壓力從工作外溢至家庭或從家庭外溢至工作，是個人壓力在不同生活層面的流動；而伴侶效應是指個人在工作或家庭壓力會外溢至伴侶，影響伴侶在壓力上的感知與回應。故伴侶效應是建立在外溢效應的前提上，並強調伴侶在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之間界線的流動。

而在台灣少有就夫妻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之間的關係進行相關研究，因此本研究以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為變項，進一步檢視夫與妻在婚姻過程中所感知的壓力與影響。

## (二) 夫妻溝通中的情感表露

夫妻在婚姻中的溝通與關係狀態，會因彼此的情感表露而相互影響，夫妻之間的情感表露對於婚姻品質和婚姻滿意度具有 8% ~ 77% 的解釋力，可用來預測新婚夫妻的婚姻狀態 (利翠珊，1995；Banmen & Vogel, 1985; Miller & Kanna, 1999; Rogge & Bradbury, 1999; Rogge et al., 2006)。情感表露會反映在被觀察者生理的特徵，如：聲調、面部的表情、特定的手勢以及身體姿勢的變化上。已有研究 (Xiao et al., 2003) 以此特徵作為情感行為判斷的依據，並發展出早期的觀察性編碼系統工具，像是 Marital Interaction Coding System 和 Facial Affect Scoring Technique，用以檢視夫妻每一個動作的背後含意，藉以協助人際關係的分析 (Xiao et al., 2003)。Gottman 針對夫妻間的溝通，在 1989 年與 Krokoff 發展出 Specific Affect Coding System (SPAFF)，利用實驗室情境重演夫妻衝突議題，用以檢視夫妻在具有衝突的情境中所展現出的情感表現，並依據夫妻在面對衝突議題時，所表現出來的語言、表情和動作等，經十五分鐘錄影後由編碼員給予情感編碼，藉以了解以及分析夫妻溝通時的狀態。SPAFF 為現今檢視夫妻溝通歷程中最具實證效力的情感編碼工具，可有效預測婚姻滿意度與關係的穩定狀態 (Coan & Gottman, 2007; Gottman, 1994)。

鑒於東、西方的文化特色與情感表達方式差異甚大，華人社會重視人情文化，在家庭互動中常以迂迴、隱晦的方式溝通，且少用語言直接表達情感。盧怡任等

(2022) 將 Gottman 研究團隊的 Specific Affect Coding System 進行中文化轉譯，完成文化對等性檢視，包括內容效度、編碼員信度、專家效度，並考量到華人社會的溝通特色，新增 5 項本土夫妻情感編碼（忍耐、感恩、欣賞、不耐煩、包容），並刪除 1 項原始編碼（哀訴），修正為適用於華人夫妻的中文版情感編碼系統 (Specific Affect Coding System-Revised Chinese Version-24, SPAFF-C-24)。本研究以 SPAFF-C-24 作為夫妻溝通中情感表露之測量工具，並將其中之正向情感出現頻次減去負向情感出現頻次所得之差額，除以 900 秒之測量時間，所得之值為「正傾向情感表露」值，以顯示夫妻情感表露之整體傾向。

### (三) 夫妻壓力與夫妻溝通中情感表露之相關研究

利翠珊 (1997) 對 30 ~ 53 歲且育有 1 ~ 25 歲子女的 25 對夫妻以深度訪談的方式研究台灣夫妻親密之情，其認為台灣夫妻在溝通的過程所展現出的型態與風貌，可以將親密之情區分為四種情份表現，並依四種情份的種類和來源分述如下：1. 「感激之情」：夫妻在長時間的婚姻歷程中，感受到伴侶對於婚姻關係的付出與犧牲；支持與配合；鼓勵；退讓、等待與包容而衍生出的感恩情份。2. 「欣賞之情」：來自於喜愛伴侶的個性、能力的情份。3. 「親近之情」：在長時間的婚姻歷程中，與伴侶一同分享以及分擔來自於彼此生命裏特殊的經驗，兩人溝通時所衍生出彼此貼近彼此感受的情份表現。4. 「契合之情」：在婚姻經歷中，因著兩人相知、相惜，以及相互依賴、信任所產生的情份表現。該研究歸結此四種親密之情的表現，會因著時間增加而相互增長，能夠反映出夫妻願意繼續維持婚姻關係的主觀感受，且會受婚姻溝通有效與否的影響。在利翠珊 (1995) 另一項對 16 對婚齡 5 年內的新婚夫妻進行深度訪談的研究中，當夫妻面臨外在壓力而產生爭執時，依據夫妻溝通情形可區分為：開放且直接的方式表達自身想法的「相敬如賓型」、吵架方式互動中不影響彼此感情的「歡喜冤家型」，以及彼此互動少且最容易潛藏婚姻危機的「貌合神離型」。此外，若妻子採「忍耐克己」、「大事化小」、「迂迴繞道」等反求諸己的溝通方式作為壓力的因應，妻子會是「既痛苦又埋怨」的負向感受呈現。



上述利翠珊的兩項研究顯示夫妻情感與婚姻溝通有密切的關係，在第一項研究中，夫妻溝通中的正向及中性情感表露可以促進夫妻親密之情的發展。在第二項研究中，當夫妻面臨壓力與衝突情境時，彼此間負向情感的表露則是會影響夫妻關係，且妻子對於負向情感的隱忍或迂迴則會形成自身壓力的累加。但上述研究皆是透過訪談所獲取之資料，呈現出夫與妻的主觀看法，研究人員並無法從實際觀察中獲取夫妻互動的觀察資料。

Neff 與 Karney (2004) 探究美國 82 對新婚且未育子女的年輕夫妻進行四年的長期觀察，探究外在壓力與夫妻關係的影響，結果發現當妻子經歷較多的工作壓力時，其婚姻滿意度與婚姻品質隨時間而驟降，丈夫則未被外在壓力所影響，顯示對妻子而言，外在壓力外溢至關係壓力的影響較大。Falconier 等人 (2015) 以行動者與伴侶相依中介模式，探究瑞士 110 對社區夫妻之外在於夫妻關係之日常生活困擾 (extradyadic stress from daily hassles) 與夫妻內在關係壓力 (intradyadic stress from relationship problems)、婚姻滿意度之關係，發現不論男性或女性之夫妻內在關係壓力皆是自身之外在於夫妻關係之日常生活困擾與婚姻滿意之中介變項。但是，女性之外在於夫妻關係之日常生活困擾，會經由自身與配偶之夫妻內在關係壓力的中介變項，進而影響男性的婚姻滿意度；而男性之外在於夫妻關係之日常生活困擾與夫妻內在關係壓力，對配偶則無伴侶效應之影響。

Ledermann 等人 (2010) 亦以行動者與伴侶相依中介模式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ediation Model, APIMeM)，分析瑞士的 345 對異性戀夫妻進行夫妻的外在壓力、關係壓力和衝突情境中之婚姻溝通三個變項間關係與影響，結果發現不論男性或女性，自身關係壓力皆為自身之外在壓力與衝突情境中之婚姻溝通與婚姻品質的中介變項；而女性之外在壓力，可透過女性之關係壓力與男性之關係壓力兩個中介變項，同時影響男性之衝突情境中之婚姻溝通與婚姻品質，但男性之外在壓力則無此效果。

從 Neff 與 Karney (2004) 的研究來看，外在壓力會對妻子造成影響，進而影響其關係壓力，但丈夫的關係壓力則未受外在壓力影響，顯現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呈現出性別因素。而 Falconier 等人 (2015) 與 Ledermann 等人 (2010) 的研究結果進一步顯示夫與妻自身的外在關係壓力會透過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婚姻品質與婚姻溝通，且女

性的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會對男性之婚姻品質與婚姻溝通產生伴侶效應，但男性的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對配偶則無伴侶效應。上述研究大致顯示外在壓力影響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婚姻溝通與婚姻品質的路徑關係，且性別會是路徑關係中的重要因素。

然而在 Xu 等人 (2016) 針對 474 對中國大陸夫妻的研究中，發現不論是丈夫或妻子，自身的外在壓力會透過自身關係壓力的中介進而影響自身關係滿意度；但是夫與妻自身的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對於配偶的關係壓力與關係滿意度則無顯著影響，亦即性別在此並無呈現伴侶效應之影響。Xu 等人對於此結果的解釋是中國大陸夫妻大都為雙薪家庭，彼此承擔相近的壓力與角色，因此性別的差異在此無法凸顯。對於台灣夫妻而言，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情感表露之關係，以及性別在此中所呈現的角色為何，則是本研究所要探究的。

#### (四) 行動者與伴侶相依中介模式

婚姻關係是透過丈夫與妻子雙方的情感交流與互動逐步建立與相互影響的，若僅從個體單方面檢視夫妻間的壓力、關係與情感互動，易因資訊的不足而產生誤差。Ledermann 等人 (2011) 的行動者與伴侶相依中介模式則是將夫妻視為一個單位，以夫妻對偶分析來研究夫妻關係的研究典範。行動者與伴侶相依中介模式如圖 1 所示， $X_1$ 、 $M_1$  與  $Y_1$  分別為其中一方的自變項、中介變項與依變項， $X_2$ 、 $M_2$  與  $Y_2$  則為對偶關係中另一方的自變項、中介變項與依變項。在此模式中，有四個直接路徑，其中  $X_1 \rightarrow Y_1$ 、 $X_2 \rightarrow Y_2$  是自身自變項至依變項的路徑，稱之為行動者效應 (actor effect)，而  $X_1 \rightarrow Y_2$ 、 $X_2 \rightarrow Y_1$  則是自身自變項至伴侶依變項的路徑，稱之為伴侶效應 (partner effect)。

而上述四條直接路徑，亦可分別探究中介變項在其間的作用，其中  $X_1 \rightarrow M_1 \rightarrow Y_1$ 、 $X_2 \rightarrow M_2 \rightarrow Y_2$  的路徑是自身自變項經由自身中介變項進而影響自身依變項，稱之為行動者效應 (actor-actor effect)； $X_1 \rightarrow M_1 \rightarrow Y_2$ 、 $X_2 \rightarrow M_2 \rightarrow Y_1$  的路徑是自身自變項經由自身中介變項進而影響伴侶依變項，稱之為行動者—伴侶效應 (actor-partner effect)； $X_1 \rightarrow M_2 \rightarrow Y_2$ 、 $X_2 \rightarrow M_1 \rightarrow Y_1$  則是自身自變項經由伴侶中介變項進而影響伴侶依變項，稱之為伴侶—行動者效應 (partner-actor effect)；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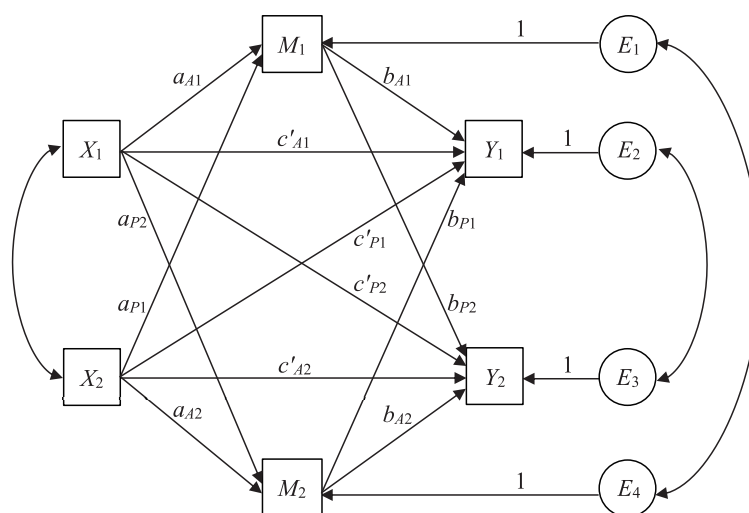


圖 1 行動者與伴侶相依中介模式

Note. From “Assessing mediation in dyadic data using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by T. Ledermann, S. Macho, and D. A. Kenny, 2011,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18, p. 607.

$X_1 \rightarrow M_2 \rightarrow Y_1$ 、 $X_2 \rightarrow M_1 \rightarrow Y_2$  則是自身自變項經由伴侶中介變項再回頭影響自身依變項，稱之為伴侶—伴侶效應 (partner-partner effect)。

在台灣，未有針對夫妻外在壓力、關係壓力及其對夫妻間溝通影響之相關研究。本研究旨在探究夫妻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夫妻溝通中情感表露之關係，並以實驗室觀察方法，即時收集夫妻溝通的互動過程，而以情感表露作為夫妻互動溝通之具體觀察標的。

## 二、研究方法

### (一) 研究目的與假設

本研究方法是將夫與妻的兩筆資料視為對偶關係資料，旨在檢視夫妻情感在夫妻二人各自的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夫妻溝通之情感表露間的關係，並透過行動者與伴侶相依中介模式，對夫妻之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以及夫妻溝通中的情感



表露，做細緻的分析。此統計方法有助於我們了解夫與妻在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以及夫妻溝通中的情感表露，其路徑為何，而夫與妻之間的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又是如何相互影響。而研究目的在於以行動者與伴侶相依中介模式，檢視丈夫與妻子之外在壓力、關係壓力以及衝突溝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之路徑關係。本研究提出下列假設：

假設一：夫與妻之外在壓力對關係壓力呈現行動者效應。

假設二：夫與妻之外在壓力對婚姻溝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呈現負向行動者效應。

假設三：夫與妻自身的外在壓力會經由自身關係壓力之中介，進而影響自身婚姻溝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呈現行動者—行動者效應。

假設四：夫與妻自身的外在壓力會經由自身關係壓力之中介，進而影響配偶婚姻溝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呈現行動者—伴侶效應。

假設五：夫與妻自身的外在壓力會經由配偶關係壓力之中介，進而影響配偶婚姻溝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呈現伴侶—行動者效應。

假設六：夫與妻自身的外在壓力會經由配偶關係壓力之中介，進而影響自身婚姻溝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呈現伴侶—伴侶效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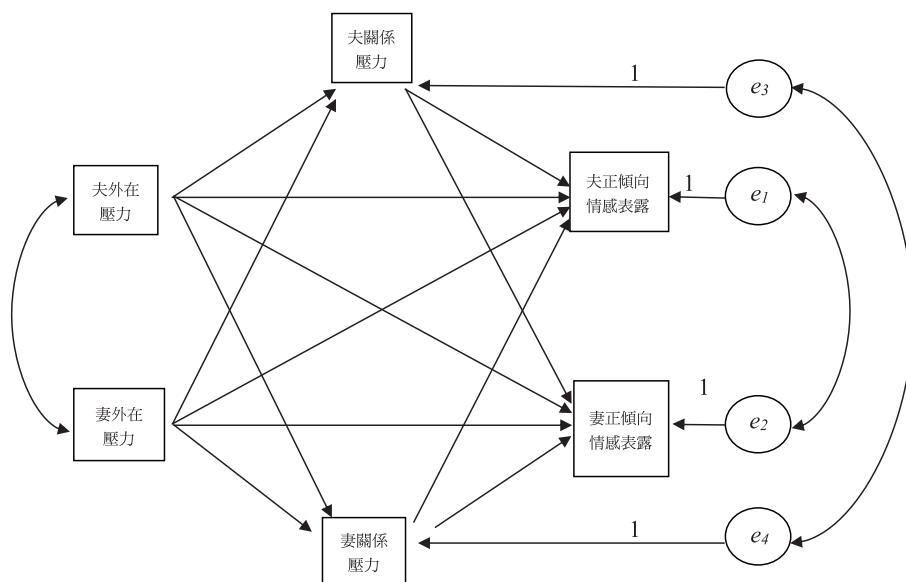


圖 2 本研究夫妻的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正傾向情感表露之 APIMeM 模式

## (二) 研究對象

本研究以實驗室法與問卷調查法進行資料收集與分析，經由網路與海報之方式招募願意參與研究並符合下述條件之夫妻：年齡為 20 歲以上、使用國或台語溝通、夫妻雙方均為未罹患重大疾病者、婚齡或同住時間至少 6 個月、夫妻雙方均同意填寫問卷且完成錄影者；且夫妻任一方非重大疾病者、且不具有認知障礙或罹患精神疾病者。研究對象之人口學資料如表 1。

本研究之夫妻資料共有 184 人 ( $n = 92$  對)。從個人與家庭特性來看，夫妻年齡範圍介於 25 ~ 86 歲，平均年齡約為 46 歲，其中 39 歲以下約佔半數，丈夫與妻子分別為 44% 與 48%。婚齡範圍為 0 ~ 58 年，平均婚齡約為 17 年，其中又以 5 年內的夫妻居多 (45%)。教育程度夫、妻皆以大學占大多數，其次為碩 / 博士，高中 (含) 以下者佔少數；職業方面，夫從事專業性職業者 (包含行政總務、法律、金融會計、醫療衛生、工程研發、教育、美容美髮、與農林漁牧) 約佔 51%，妻則約佔 44%；夫從事非專業性工作者 (包含銷售、餐飲、家管和自由業) 約佔 30%，妻則約佔 23%，而無工作者夫約佔 18%，妻約佔 33%。經濟方面，僅有 2 位妻子自覺經濟清寒 (2%)，其餘夫妻皆自覺經濟達到普通甚至小康 / 富裕。

## (三) 資料蒐集程序

每對同意參加研究的夫妻皆需完成一次婚姻史訪談、夫妻衝突討論互動錄影以及問卷量表的填寫。本研究依據 Gottman (1998) 所擬定的夫妻互動錄影程序進行，讓夫妻選定日常生活中的衝突素材，在實驗室中呈現夫妻日常生活中的情感互動，藉以捕捉夫妻互動交流中真實的情感表露。資料蒐集程序如下：

### 1. 夫妻婚姻史訪談

夫妻一同於獨立空間進行，目的為建立研究者與夫妻的熟識和信任關係並了解其婚姻史、夫妻關係與婚姻觀。訪談內容包含夫妻如何認識、追求到決定結婚，以及婚姻中美好與痛苦之經歷。整個婚姻史訪談過程約進行 10 至 15 分鐘。

表 1 夫妻樣本特性

變項名稱	丈夫樣本 ( <i>n</i> = 92)		妻子樣本 ( <i>n</i> = 92)		夫妻樣本 ( <i>n</i> = 184)
	人數	百分比	人數	百分比	平均值 (標準差)
年齡(範圍：25~86歲)					45.98 (15.13)
39歲以下	40	43.50	44	47.80	
40-59歲	29	31.50	30	32.60	
60歲以上	23	25.00	18	19.60	
婚齡(範圍：0~58年)					17.20 (17.29)
5年以下	41	44.57	41	44.57	
6-30年	27	29.35	26	28.26	
31年以上	24	26.09	25	27.17	
教育程度					
高中以下	16	17.40	23	25.0	
大學	50	54.30	40	43.50	
碩/博士	26	28.30	29	31.50	
職業類別					
專業性工作	47	51.10	40	43.50	
非專業性工作	28	30.40	21	22.80	
沒有工作	17	18.50	31	33.70	
經濟狀態					
貧窮/清寒	0	0.00	2	2.17	
普通	52	56.52	48	52.17	
小康/富裕	40	43.48	42	45.65	

註：表中夫妻所書寫的「婚齡」不同，乃因夫妻兩人分開填寫，且有5成多的夫妻為中老年，可能因年齡而影響記憶之準確性，使得夫妻二人所填寫的「婚齡」有些許的落差。

## 2. 選定夫妻討論議題

研究者使用夫妻問題困擾量表 (Couple's Problem Inventory) 為工具，以訪談方式協助夫妻聚焦於最近一個月最感困擾的爭執議題，作為夫妻衝突討論互動錄影之討論主題。

## 3. 夫妻衝突討論錄影

決定衝突討論議題後，安排夫與妻對坐，並以攝影機捕捉腰部以上的姿勢和表情。說明程序、並確認夫妻雙方無其他疑問後，即開始 15 分鐘的衝突議題討論和同步錄影，研究人員在夫妻開始討論時離場，並於 15 分鐘後返回。

## 4. 問卷評量

待錄影結束後，研究者將請夫妻回想方才衝突討論的過程，並由夫與妻各自獨立填寫「夫妻壓力生活事件量表」，以了解夫妻所感知的最近一年之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夫妻完成所有研究流程後，給予每對夫妻 500 元的參與報酬，以感謝其參與。

# (四) 研究工具

## 1. 正傾向情感表露

本研究使用的情感表露評估工具乃是林梅鳳研究團隊（盧怡任等，2022）譯自 Gottman (1994) 特定情感編碼系統 (Specific Affect Coding System, SPAFF)，並加入台灣華人情感編碼之特定情感編碼系統中文版 (Specific Affect Coding System-Revised Chinese Version-24, SPAFF-C-24)，進行夫妻衝突討論過程情感表露的編碼與計分結果。此編碼系統中共有 24 項的情感碼（如附錄二），分為 9 項正向情感碼、14 項負向情感碼和 1 項中性情感碼。情感表露程度以秒為單位進行編碼計次，由編碼員將每一秒的情感表露進行編碼，計算正向、負向、與中性情感出現之總次數，將 900 秒 (15 分鐘) 中所出現的正向情感次數減去負向情感次數後，所得之差數除以 900 所後得的數值，即為參與者正傾向情感表露程度之得分。本研究由受過訓練的編碼員就此工具之 24 項情感碼進行編碼，而不同編碼員的夫妻編碼結果之 Kappa 值為

.56，顯示編碼員在情感編碼具有中度一致性。

## 2. 夫妻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

在夫妻壓力方面，本研究採用 Xu 等人 (2016) 譯自 Bodenmann et al. (2007) 編制的夫妻壓力生活事件量表 (Multidimensional Stress Questionnaire for couples into Chinese, MSQ-C)，此量表包含 18 題 (如附錄一)，採四點量表計分 (1 分為沒有壓力；4 分為強烈壓力)，分數越高顯示其壓力越大，包含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 (原量表譯為內在壓力) 兩向度：

- (1) 外在壓力：包含工作、社交、自由時間、照顧小孩、原生家庭、生活條件、經濟、與日常瑣事等，共 8 題，在 Xu 等人 (2016) 研究的中國樣本中，夫與妻的內部一致性係數皆為 .69，具可接受信度；而本研究之台灣夫與妻樣本之 Cronbach  $\alpha$  皆為 .89。
- (2) 關係壓力：包含伴侶間意見、人生觀、不良習性、個性、不雅行為、能力、關係束縛、關係距離、責任義務、與關係忽略等相處壓力，共 10 題，在 Xu 等人 (2016) 研究的中國樣本中，夫的內部一致性係數為 .80，妻則為 .75，具可接受信度，在本研究之台灣夫與妻樣本中，其 Cronbach  $\alpha$  皆為 .89。

## 3. 夫妻困擾問題

本研究之夫妻困擾評估工具以 Gottman (1977) 13 題夫妻問題量表為基礎，考量台灣夫妻對婚姻問題的感知具文化特殊性，故加入周玉慧 (2009) 所歸納的八大項華人夫妻常見衝突問題類型，經剔除重複項目並新增題項後，彙整為本研究所使用之夫妻困擾問題量表，包括性生活、溝通、家庭與朋友、不良習慣、工作、對待態度、豢養寵物、生病、治療、身體改變或心理煩惱、與未來計畫等共 20 題，為自填式問卷，每題得分介於 0-10 分，0 分表示無困擾，10 分表示該困擾嚴重影響夫妻關係，以其得分評估夫妻日常生活中常見問題對婚姻關係影響的嚴重度，並從中選出最感到困擾的爭執或衝突項目，成為夫妻互動錄影時的討論議題。在議題討論上，夫妻一致的前三大困擾問題為對待親戚的方式、夫妻間溝通以及夫妻對待彼此的態度。



## (五) 分析策略

本研究以 SPSS 軟體進行分析描述統計、以 Spearman's rho 分析研究各變項間的相關性，以及以 AMOS 統計軟體進行結構方程模型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 分析，並以行動者與伴侶相互依賴中介模式 (APIMeM) 檢視，以及依循 Ledermann 等人於 2011 年之設計，僅包含外顯變項，故在此模型中，直接使用各變項之總分進行分析，以檢視夫妻各自的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夫妻溝通之情感表露三者之行動者與伴侶效應。模型適配度指標採卡方值與自由度的比值 ( $\chi^2/df$ ) < 0.3；GFI (Goodness of Fit Index) > 0.9；RMR (root mean-square residual) 和 RMSEA (root mean-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 0.08 等，作為研究資料與假設模型間具良好適配之依據 (Bagozzi & Yi, 1988; Henry & Stone, 1994; Hu & Bentler, 1999；陳耀茂，2021)。

為檢驗研究假設一和二，本研究將各自檢視夫與妻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對婚姻溝通中之正傾向情感表露的作用路徑效果，並以關係壓力對夫妻正傾向情感表露的中介作用路徑效果 (圖 2) 檢驗假設 3。

## 三、研究結果

### (一) 夫妻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之分析

夫妻之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之描述性統計如 (表 2)。分別檢視丈夫與妻子感受較高之外在壓力項目，發現丈夫與妻子在「工作與教育」、「經濟」以及「自由時間」三項上之外在壓力感受程度最高，此三項目分別佔丈夫與妻子外在壓力的 41.1% 與 41.8%，唯上述題項平均數皆在 2 以內，對夫與妻造成之壓力並不強烈。

若從關係壓力檢視夫妻各自認為最強烈之壓力源，發現丈夫以「與配偶意見不合」、「配偶不易相處的個性」、以及「對於關係與人生持有不同態度」的感受壓力程度最高，佔丈夫關係壓力的比例 34.2%；而妻子則為「與配偶意見不合」、「對於關係與人生持有不同態度」、以及「配偶能力欠缺」，佔妻子關係壓力的比例

35.2%。本結果顯示丈夫和妻子在感知關係壓力程度上，皆對「與配偶意見不合」的感受較強，但上述的題項題項平均數也皆在 2 以內，整體而言對夫與妻造成之壓力並不強烈。

表 2 夫妻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之分析

題 項	丈夫( $n = 92$ )			妻子( $n = 92$ )		
	平均數	標準差	題項百分比	平均數	標準差	題項百分比
外在壓力	13.26	4.07	100.0	13.68	4.42	100.0
工作、教育	2.02	0.91	15.3	2.10	0.96	15.3
社交	1.50	0.62	11.3	1.57	0.77	11.4
自由時間	1.67	0.77	12.6	1.77	0.92	13.0
小孩	1.54	0.82	11.6	1.62	0.88	11.8
原生家庭	1.66	0.91	12.5	1.68	0.75	12.3
生活條件	1.58	0.73	11.9	1.47	0.75	10.7
經濟	1.75	0.85	13.2	1.85	0.94	13.5
日常瑣碎	1.53	0.64	11.6	1.63	0.67	11.9
關係壓力	15.34	4.64	100.0	16.66	5.04	100.0
與配偶意見不合	1.87	0.68	12.2	2.09	0.72	12.5
對關係與人生持不同態度	1.67	0.74	10.9	1.89	0.76	11.4
配偶的不良習性	1.62	0.64	10.6	1.78	0.81	10.7
配偶不易相處的個性	1.70	0.75	11.1	1.76	0.83	10.6
配偶的不雅行為	1.28	0.48	8.4	1.46	0.82	8.7
配偶能力欠缺	1.61	0.77	10.5	1.88	0.85	11.3
關係受束縛	1.38	0.63	9.0	1.43	0.68	8.6
與配偶有距離	1.25	0.48	8.2	1.40	0.65	8.4
責任與義務分配不滿意	1.41	0.60	9.2	1.50	0.70	9.0
忽略配偶	1.54	0.72	10.1	1.47	0.65	8.8

以 Kolmogorov-Smirnov test 檢驗依變項（正傾向情感表露）的結果為未符合常態分佈 ( $p < 0.001$ )。在 15 分鐘衝突情境的夫妻溝通中，丈夫的正向情感碼與負向情感碼平均各自出現 34.80 次與 101.28 次，正傾向情感表露程度為 -0.07 分；妻子的正

向情感碼與負向情感碼平均各自出現 39.14 次與 112.36 次，正傾向情感表露程度為 -0.08 分（表 3）。顯示夫妻在 900 秒溝通的整體趨勢上，傾向以負向情感表現討論衝突。

表 3 夫妻溝通中的情感表露分析

變項名稱	丈夫( $n = 92$ )		妻子( $n = 92$ )		$t$	$p$
	平均數	標準差	平均數	標準差		
SPAFF-C-24						
正向碼(頻次)	34.80	34.09	39.14	39.49	-1.30	.20
負向碼(頻次)	101.28	94.44	112.36	114.91	-1.05	.30
中性碼(頻次)	763.91	89.76	748.50	110.03	1.48	.14
正傾向情感表露程度	-.07	.12	-.08	.15	.58	.56

### (三)行動者與伴侶相依中介模式分析

夫妻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正傾向情感表露的描述性統計與相關分析分如表 4、表 5。在本研究各變項中，除妻子之關係壓力顯著高於丈夫之關係壓力，其餘則無顯著差異（如表 4）；夫與妻在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方面，有顯著正相關。而夫與妻之外在壓力、關係壓力分別與正傾向情感表露方面，除夫之正傾向情感表露與自身之外自壓力以及妻之外在壓力無顯著相關之外，其餘之外在壓力、關係壓力分別與正傾向情感表露有顯著負相關（如表 5）。

表 4 夫妻外在壓力、關係壓力和正傾向情感表露之描述性統計 ( $n = 92$  對)

變項名稱	夫		妻		$Z$	Wilcoxon Signed Rank Test Probability
	$M$	$SD$	$M$	$SD$		
外在壓力	13.27	4.07	13.68	4.42	-0.84	0.40
關係壓力	15.34	4.64	16.66	5.04	-2.56**	0.01
正傾向情感表露	-0.07	0.12	-0.08	0.15	-0.20	0.85

\*\* $p < 0.01$

表 5 夫妻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正傾向情感表露的相關分析

變項名稱	1	2	3	4	5	6
1.丈夫外在壓力						
2.丈夫關係壓力	.649**					
3.丈夫正傾向情感表露	-.165	-.224*				
4.妻子外在壓力	.505**	.283**	-.143			
5.妻子關係壓力	.304**	.290**	-.276**	.547**		
6.妻子正傾向情感表露	-.290**	-.415**	.557**	-.269**	-.352**	

\* $p < .05$ . \*\* $p < .01$

本研究以 AMOS 統計軟體進行結構方程模式分析並以行動者與伴侶相互依中介模式（完整模型）檢視其中的相關關係，信賴區間則以 Bootstrap 計算之，將正傾向情感表露分數，以及夫妻的外在壓力和關係壓力的總分各自加總後作為觀測變數（四方形）的資料來源，總效果、直接效果與間接效果研究結果如表 6 與圖 3。考量夫妻各自的外在壓力到正傾向情感表露之 4 條直接路徑沒有顯著效果，故刪去此 4 條直接路徑後，再以 AMOS 統計軟體分析所得模型適配度指標分別為  $\chi^2 = 0.323$ 、 $df = 4$ 、 $\chi^2/df = 0.081$ 、 $GFI = 0.999$ 、 $AGFI = 0.994$ 、 $RMR = 0.007$ 、 $RMSEA = 0.000$ ，顯示此模型具良好適配度。

研究結果顯示（如表 6、圖 3），夫與妻的外在壓力與自身的關係壓力路徑關係成立，因此「假設一：夫與妻之外在壓力對關係壓力呈現行動者效應」成立；而夫與妻之外在壓力與自身的正傾向情感表露路徑關係不成立，因此「假設二：夫與妻之外在壓力對婚姻溝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呈現負向行動者效應」不成立。

而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正傾向情感表露的關係上，研究結果顯示：在行動者一行動者效應上，「夫外在壓力影響夫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夫正傾向情感表露」路徑關係不成立，而「妻外在壓力影響妻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妻正傾向情感表露」路徑關係成立，因此「假設三：夫與妻自身的外在壓力會經由自身關係壓力之中介，進而影響自身婚姻溝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呈現行動者一行動者效應」部分成立。在行動者一伴侶效應上，「夫外在壓力影響夫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妻正傾向情感表露」路徑關係成立，且「妻外在壓力影響妻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夫正傾向情感表露」

表 6 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正傾向情感表露之行動者效應和伴侶效應

參 數	估計值	95%信賴區間 下界	95%信賴區間 上界	P值
行動者效應				
丈夫外在壓力→丈夫關係壓力	0.62	0.45	0.77	0.00
妻子外在壓力→妻子關係壓力	0.55	0.35	0.72	0.00
丈夫關係壓力→丈夫正傾向情感表露	-0.16	-0.40	0.07	0.19
妻子關係壓力→妻子正傾向情感表露	-0.30	-0.51	-0.10	0.01
丈夫外在壓力→丈夫正傾向情感表露	0.03	-0.22	0.33	0.75
妻子外在壓力→妻子正傾向情感表露	0.05	-0.21	0.29	0.68
伴侶效應				
丈夫外在壓力→妻子關係壓力	0.04	-0.14	0.23	0.71
妻子外在壓力→丈夫關係壓力	-0.03	-0.20	0.16	0.78
丈夫關係壓力→妻子正傾向情感表露	-0.37	-0.55	-0.16	0.00
妻子關係壓力→丈夫正傾向情感表露	-0.33	-0.60	-0.69	0.12
丈夫外在壓力→妻子正傾向情感表露	0.02	-0.22	0.27	0.86
妻子外在壓力→丈夫正傾向情感表露	0.03	-0.32	0.29	0.9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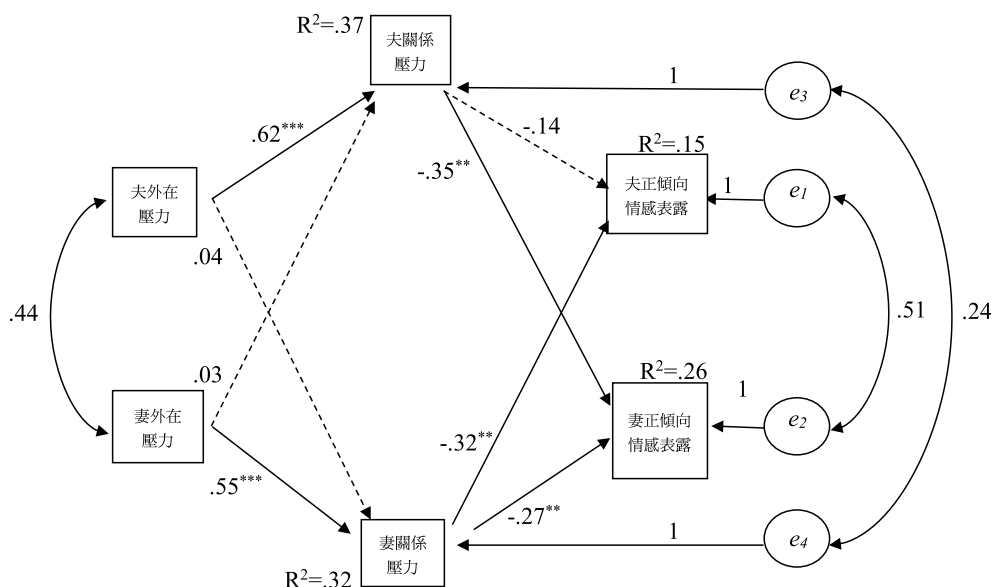


圖 3 夫妻壓力與情感表露之路徑分析結果



路徑關係成立，因此「假設四：夫與妻自身的外在壓力會經由自身關係壓力之中介，進而影響配偶婚姻溝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呈現行動者—伴侶效應」成立。在伴侶—行動者效應上，「夫外在壓力影響妻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妻正傾向情感表露」與「妻外在壓力影響夫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夫正傾向情感表露」路徑關係皆不成立，因此「假設五：夫與妻自身的外在壓力會經由配偶關係壓力之中介，進而影響配偶婚姻溝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呈現伴侶—行動者效應」不成立。在伴侶—伴侶效應上，「夫外在壓力影響妻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夫正傾向情感表露」與「妻外在壓力影響夫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妻正傾向情感表露」路徑關係皆不成立，因此「假設六：夫與妻自身的外在壓力會經由配偶關係壓力之中介，進而影響自身婚姻溝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呈現伴侶—伴侶效應」不成立。

在解釋變異量部分，夫與妻的外在壓力對丈夫關係壓力的解釋變異量為 37% ( $R^2 = .37$ )、對妻子關係壓力的解釋變異量為 32% ( $R^2 = .32$ )。而夫妻二人的外在壓力在夫與妻關係壓力的中介作用後，對丈夫正傾向情感表露的解釋變異量為 15% ( $R^2 = .15$ )、對妻子正傾向情感表露的解釋變異量為 26% ( $R^2 = .26$ )。

## 四、討論與結論

### (一) 夫妻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夫妻溝通之正傾向情感表露

本研究目的在應用行動者與伴侶相依中介模式，檢視台灣夫妻之外在壓力、關係壓力和正傾向情感表露的關聯。研究結果顯示，丈夫與妻子各自的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皆僅具行動者導向，亦即丈夫和妻子的關係壓力僅受來自自身的外在壓力所影響，但不受伴侶的外在壓力之影響。本結果相符於 Randall 與 Bodenmann (2009) 的壓力外溢 (stress spillover) 理論，即外在壓力會透過不同層面外溢至夫妻內部，進而造成夫妻關係之壓力；此結果與 Xu 等人 (2016) 以大陸夫妻為樣本之發現相同，顯示壓力外溢具備跨文化的特性。

上述研究結果與 Ledermann 等人 (2010) 的研究結果一致，在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上，夫與妻皆呈現行動者效應，且兩者為正相關。而 Neff 與 Karney (2004) 的研究

結果顯示，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只在妻子上有相關，在丈夫上則無相關，則與本研究結果不一致。本研究結果支持 Ledermann 等人 (2010) 的結論，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之關聯並無性別上的差異。

在外在壓力與正傾向情感表露的關係上，研究顯示不論是丈夫或妻子，其自身的外在壓力與正傾向情感表露皆無顯著相關。在 Falconier 等人 (2015) 的研究中，夫與妻之外在於夫妻關係之日常生活困擾與婚姻滿意度無直接相關；在 Ledermann 等人 (2010) 的研究中，外在壓力與衝突情境中之夫妻溝通亦無直接相關。本研究和前述研究結果一致。

而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正傾向情感表露的關係上，本研究顯示出有「妻外在壓力影響妻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夫正傾向情感表露」(行動者—伴侶效應)、「夫外在壓力影響夫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妻正傾向情感表露」(行動者—伴侶效應)與「妻外在壓力影響妻關係壓力，進而影響妻正傾向情感表露」(行動者—行動者效應)等三條路徑成立，上述結果顯示了幾點意涵。第一，夫與妻之外在壓力均透過自身關係壓力的中介，進而影響配偶之正傾向情感表露，此結果與 Westman (2006) 的論點一致，即壓力不僅會從個人工作層面外溢 (spillover) 至關係層面，亦會從個人外溢至伴侶，產生伴侶效應 (crossover)。第二，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正傾向情感表露之行動者—行動者效應僅在妻子身上顯現，丈夫之行動者—行動者效應不成立。在 Falconier 等人 (2015)、Ledermann 等人 (2010) 以及 Xu 等人 (2016) 的研究中，夫與妻之行動者—行動者效應皆成立，本研究之行動者—行動者效應則呈現出夫妻之間的性別差異。

第三，本研究中，妻子之正傾向情感表露受到兩條路徑影響，分別是夫自身外在壓力經由自身關係壓力的中介，進而影響妻子正傾向情感表露，以及妻子自身外在壓力經由自身關係壓力的中介，進而影響自身正傾向情感表露；而丈夫之正傾向情感表露，則是僅受到妻子外在壓力經由妻子關係壓力的中介，進而影響丈夫之正傾向情感表露，並不受到自身外在壓力與自身關係壓力之影響。本研究結果與 Ledermann 等人 (2010) 以及 Falconier 等人 (2015) 的研究結果不完全一致，在上述研究中，不論是丈夫或妻子的婚姻溝通，皆同時受到自身與伴侶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

之影響。而本研究則顯示丈夫之正傾向情感表露不受自身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之影響，而是受妻子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之路徑關係影響較大。不一致之處可能在於上述研究是以問卷收集夫妻之溝通狀態，是採事後回溯的方式，而本研究則是以實驗室方法即時觀察夫妻溝通中的情感表露，丈夫情感表露的伴侶效應顯現丈夫的正傾向情感表露程度易受溝通當下妻子的關係壓力感受所影響，而較少受自身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所影響，故妻子在溝通中所感知的壓力與呈現的狀態會是夫妻溝通中的重要因素。因此資料蒐集方法的不同可能造成研究結果的不同，也顯示本研究以即時方式觀察夫妻溝通中的情感表露，有其學術應用上的重要價值。

本研究也顯示妻子在夫妻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婚姻溝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妻子在溝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程度同時受到丈夫與自身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路徑之影響，而丈夫在溝通中的正傾向情感表露程度僅受到妻子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路徑所影響，兩者呈現出明顯的性別差異。此結果顯示妻子在婚姻關係中是較敏感且易受雙方關係所影響，並容易將所感知之壓力展現於夫妻溝通的情緒中，而妻子對壓力的展現又會進一步影響丈夫於夫妻溝通中的情緒表現。此結果也相映於利翠珊(1995)的研究，夫妻在處理來自家族代間關係或是夫妻之間的衝突時，丈夫通常因忙於工作或不善於表達內心想法，對於衝突較採取被動方式，而由妻子作為面對壓力與改變關係的發動者。然而在 Xu 等人(2016)針對中國大陸夫妻的研究中，夫與妻與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關係滿意僅具有行動者一行動者效應，並未有中介變項的伴侶效應，性別在此並無差異。本研究與 Xu 等人(2016)的研究差異顯示在華人夫妻之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相關夫妻品質變項之路徑關聯上，仍有進一步探討之必要。

此外，在本研究中，夫與妻在衝突情境之十五分鐘討論中，負向情感出現的頻次遠高於正向情感。Gottman (1994)認為在夫妻溝通中，正向與負向情感表露頻次約為 5 比 1 是維持婚姻穩定的黃金比例，故負向情感表露頻次太高會影響婚姻之穩定性。對於婚姻關係的經營，Gottman 與 Silver (2015)建議夫妻平時應培養對彼此的欣賞與喜愛，多表達對配偶正向態度與情感，並在兩人意見不合或衝突時，試著理解對方的負向情緒，接納雙方觀點的不同並舒緩對方情緒。

## (二) 研究限制

本研究以台灣夫妻作為相依樣本之初探，其主要限制有四。其一，收案場域在南部某社區中心與網路宣傳進行招募，故參加的夫妻多來自於南部社區，有待未來研究擴展到其他地區樣本，藉以增加樣本之異質性與研究結果的外展性。其二，本研究以 SEM 進行理論模型架構之分析，所需樣本數建議至少達 200 人以上，而本研究之樣本數稍嫌不足，雖然相依樣本能減少樣本數需求，但仍可能影響分析結果的穩定性 (Schumacker & Lomax, 2004)。其三，本研究在夫妻互動資料蒐集上，是採夫妻婚姻史訪談、夫妻衝突互動錄影與填寫夫妻壓力生活事件量表的順序，而在夫妻衝突討論後填寫問卷，可能會讓夫妻對壓力有高估的可能，未來研究在實施上可以調整資料蒐集順序。最後，本研究結果中的外在壓力、關係壓力與正傾向情感表露之殘差值有顯著的正向影響力，基於本研究欲探討外在壓力與關係壓力、正傾向情感表露之關係，以及外在壓力與正傾向情感表露經由關係壓力後的關係，故未再就殘差值多加以討論之，建議未來的夫妻研究可就此初探結果加以深究之。

## 參考文獻

- 利翠珊 (1995)。夫妻互動歷程之探討：以台北地區年輕丈夫妻子為歷的一項初探性研究。**本土心理學研究**，(4)，260-321。https://doi.org/10.6254/1995.4.260
- 利翠珊 (1997)。婚姻中親密關係的形成與發展。**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0(4)，101-128。
- 利翠珊 (2005)。身心障礙兒童家中夫妻的壓力、付出與恩情。**中華心理衛生學刊**，18(2)，25-54。https://doi.org/10.30074/FJMH.200506\_18(2).0002
- 周玉慧 (2004)。夫妻對偶互動關係。**應用心理研究**，(24)，63-64。
- 周玉慧 (2005)。回首從前、期待未來的夫妻關係研究。**應用心理研究**，25，12-13。
- 周玉慧 (2007)。夫妻間衝突因應策略之類型變遷及其長期影響。**中華心理學刊**，53(2)，229-253。https://doi.org/10.6129/CJP.2011.5302.06

- 陳耀茂 (2021)。入門結構方程式 -Amos 應用。五南圖書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 盧怡任、陳淑娟、陳宇平、林梅鳳 (2022)。台灣夫妻情感互動觀察系統的跨文化轉譯研究。中華心理學刊，64(4)，493-514。
- Bagozzi, R. P., & Yi, Y. (1988). On the evaluation of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Journal of 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 16(1), 74-94.
- Banmen, G., & Vogel, N. A. (198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al quality and interpersonal sexual communication. *Family Therapy*, 12, 45-58.
- Bodenmann, G. (1995). A systemic-transactional conceptualization of stress and coping in couples. *Swiss Journal of Psychology / Schweizerische Zeitschrift für Psychologie / Revue Suisse de Psychologie*, 54(1), 34-49.
- Bodenmann, G., Ledermann, T., & Bradbury, T. N. (2007). Stress, sex, and satisfaction in marriage. *Personal Relationships*, 14, 551-569. <http://dx.doi.org/10.1111/j.1475-6811>
- Bodenmann, G., Ledermann, T., Blattner, D., & Galluzzo, C. (2006). Associations among everyday stress, critical life events, and sexual problems. *The Journal of Nervous and Mental Disease*, 194(7), 494-501. <https://doi.org/10.1097/01.nmd.0000228504.15569.b6>
- Coan, J. A., & Gottman, J. M. (2007). The Specific Affect Coding System (SPAFF). In J. A. Coan & J. J. B. Allen (Eds.), *Series in affective science. Handbook of Emotion Elicitation and Assessment* (p. 267-28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alconier, M. K., Nussbeck, F. W., Bodenmann, G., Schneider, H., & Bradbury, T. (2015). Stress from daily hassles in couples: Its effects on intradyadic stress,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and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Journal of Marital and Family Therapy*, 41(2), 221-235. <https://doi:10.1111/jmft.12073>
- Geist, R. L., & Gilbert, D. G. (1996). Correlates of expressed and felt emotion during marital conflict: Satisfaction, personality, process, and outcome.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1(1), 49-60. [https://doi.org/10.1016/0191-8869\(96\)00049-9](https://doi.org/10.1016/0191-8869(96)00049-9)
- Gottman, J. M. (1994). *What predicts divor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ital processes and marital outcomes*.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https://doi.org/10.4324/9781315806808>



- Gottman, J. M., Coan, J., Carrere, S., & Swanson, C. (1998). Predicting marital happiness and stability from newlywed interactions.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5-22. <https://doi.org/10.2307/353438>
- Gottman, J. M., Markman, H., & Notarius, C. (1977). The topography of marital conflict: A sequential analysis of verbal and nonverbal behavior.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461-477. <https://doi.org/10.2307/350902>
- Gottman, J. M., & Silver, N. (2015). *The seven principles for making marriage work: a practical guide from the country's foremost relationship expert*. New York: Harmony Books.
- Henry, J. W., & Stone, R. W. (1994). A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 of end-user satisfaction with a computer-based medical information system. *Information Resources Management Journal*, 7(3), 21-33.
- Hu, L. T., & Bentler, P. M. (1999). Cutoff criteria for fit indexes in covariance structure analysis: Conventional criteria versus new alternativ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6(1), 1-55. <https://doi.org/10.1080/10705519909540118>
- Jackson, G. L., Trail, T. E., Kennedy, D. P., Williamson, H. C., Bradbury, T. N., & Karney, B. R. (2016). The salience and severity of relationship problems among low-income couple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30(1), 2-11. <https://doi.org/10.1037/fam0000158>
- Karney, B. R., & Bradbury, T. N. (1995). The longitudinal course of marital quality and stability: A review of theory, methods, and research. *Psychological Bulletin*, 118(1), 3-34. <https://doi.org/10.1037//0033-2909.118.1.3>
- Ledermann, T., Bodenmann, G., Rudaz, M., & Bradbury, T. N. (2010). Stress, communication, and marital quality in couples. *Family Relations*, 59(2), 195-206. <https://doi.org/10.1111/j.1741-3729.2010.00595.x>
- Ledermann, T., Macho, S., & Kenny, D. A. (2011). Assessing mediation in dyadic data using the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model.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18(4), 595-612. <https://doi.org/10.1080/10705511.2011.607099>

- Miller, N. B., & Kanna, L. A. (1999). Predicting marital quality in Ghana. *Journal of Comparative Family Studies*, 30(4), 599-615. <https://doi.org/10.3138/jcfs.30.4.599>
- Neff, L. A., & Karney, B. R. (2004). How does context affect intimate relationships? Linking external stress and cognitive processes within marriage.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30(2), 134-148. <https://doi.org/10.1177/0146167203255984>
- Randall, A. K., & Bodenmann, G. (2009). The role of stress on close relationships and marital satisfaction.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29(2), 105-115. <https://doi.org/10.1016/j.cpr.2008.10.004>
- Randall, A. K., & Bodenmann, G. (2017). Stress and its associations with relationship satisfaction. *Current Opinion in Psychology*, 13, 96-106. <https://doi.org/10.1016/j.copsyc.2016.05.010>
- Rogge, R. D., & Bradbury, T. N. (1999). Till violence does us part: The differing roles of communication and aggression in predicting adverse marital outcomes. *Journal of Consulting and Clinical Psychology*, 67(3), 340-351. <https://doi.org/10.1037/0022-006X.67.3.340>
- Rogge, R. D., Bradbury, T. N., Hahlweg, K., Engl, J., & Thurmaier, F. (2006). Predicting marital distress and dissolution: Refining the two-factor hypothesis. *Journal of Family Psychology*, 20(1), 156-159. <https://doi.org/10.1037/0893-3200.20.1.156>
- Schumacker, R. E., & Lomax, R. G. (2004). *A beginner's guide to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psychology press. <https://doi.org/10.4324/9781410610904>
- Traa, M. J., De Vries, J., Bodenmann, G., & Den Ouden, B. L. (2015). Dyadic coping and relationship functioning in couples coping with cancer: A systematic review. *British Journal of Health Psychology*, 20(1), 85-114. <https://doi.org/10.1111/bjhp.12094>
- Westman, M. (2006). Crossover of stress and strain in the work-family context. In F. Jones, R. J. Burke & M. Westman (Eds.), *Work-life Balance: A Psychological Perspective*.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 Xiao, J., Moriyama, T., Kanade, T., & Cohn, J. F. (2003). Robust full-motion recovery of head by dynamic templates and re-registration techniqu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maging Systems and Technology*, 13(1), 85-94.
- Xu, F., Hilpert, P., Nussbeck, F. W., & Bodenmann, G. (2016). Testing stress and dyadic coping processes in Chinese couple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tress Management*, 25(1), 84-95. <https://doi.org/10.1037/str0000051>

## 附錄一 夫妻壓力生活事件量表

外在壓力	關係壓力
1、工作、教育(不知所措、期限壓力、高期望、無挑戰、缺乏認可、職業發展等)。	1、與伴侶意見不合(衝突、爭論)。
2、社交(與鄰居、同事、熟人、社會關係和閒人有衝突)。	2、對於關係與人生持有不同態度(不同的目標、需求和觀點)。
3、自由時間(期限壓力、太多活動、不滿意的娛樂活動、個人時間太少、有壓力進行)。	3、伴侶的不良習性(如：禮貌、粗心大意、心不在焉)。
4、小孩(照顧小孩、培養小孩、陪小孩玩、依賴家長、束縛家長、操心過多)。	4、伴侶不易相處的個性(如：脾氣、靈性、依賴、正直)。
5、原生家庭(分離、依賴、衝突、維繫等)。	5、伴侶的不雅行為(如：吸煙、醉酒、過度看電視，或飲食習慣)。
6、生活條件(住宅大小、噪音、地點等)。	6、伴侶能力欠缺(溝通能力、解決問題、處理壓力等)。
7、經濟(貸款、缺錢、工資不漲等)。	7、關係受束縛(獨處時間少、太過親近、形影不離等)。
8、日常瑣事(丟失或換新、不時困擾、派對、交通阻塞、延誤等)。	8、與伴侶有距離(不夠親近、親密、沒有共同愛好和興趣等)。
	9、責任與義務分配不滿意(如：家務、照顧小孩和工作等)。
	10、忽略伴侶(關心太少、示愛、性生活)。

## 附錄二 特定情感編碼系統中文版

種 類	內 容
正向情感碼	感興趣、低度的認同、高度的認同、關愛、幽默、驚奇/開心、包容、欣賞、感激、
負向情感碼	嫌惡、鄙視、挑釁、低強度的指使、高強度的指使、批評、生氣、緊張、尷尬的幽默感、辯護、傷心、冷眼旁觀、不耐煩、忍讓
中性情感碼	中性

# Stress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Emotional Expression in Couples

PEI-CHING TSAI, MEI-FENG LIN, YU-PING CHEN, YI-JEN LU

**Purpose:** We used dyadic analysis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of external stress and relationship stress to emotional expression between husbands and wives in Taiwan. **Methods:** A total of 92 couples in Southern Taiwan participated in a 15 minute session of laboratory-based conflict discussion. They were video-recorded with their informed consent. They also completed questionnaires on external stress and relationship stress. Two researchers separately used the 24 codes from the Chinese Specific Affect system to code the emotional behaviors expressed during each couple's conflict. We applied dyadic analysis to examine the interdependence of the variables. **Results:** For both husbands and wives, external stress positively corresponded with the perception of relational stress. The wives' positive-oriented emotional expression was affected both by her husband's and her own perception of relational stress. In contrast, a husband's positive-oriented emotional expression was mainly influenced by his wife's perception of relational stress. **Conclusions:** The gender difference we identified suggests that the wife's perception of relationship stress impacts the positive-oriented emotional expressions of the couple.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plore whether these findings are linked with the particular dyadic interactions investigated or whether they reflect culturally-related factors for Taiwanese couples.

**Key words:** marital relationship, stress, emotional expression, actor-partner interdependence

---

Pei-Ching Tsai: Psychiatric Acute Ward Assistant Head Nurse, Ditmanson Medical Foundation Chia-Yi Christian Hospital Nursing Department.

Mei-Feng Lin: Professor, College of Medicine, Department of Nursing, National Cheng Kung University.

Yu-Ping Chen: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ounseling and Guidance, National University of Tainan.

Yi-Jen Lu: Assistant Professor, Mental Health and Counseling Center/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ational Yang Ming Chiao Tung University. (Corresponding author, E-mail: matt7075@nycu.edu.tw)